

A long-exposure photograph of the Shanghai skyline at night, featuring the Oriental Pearl Tower and other skyscrapers. The image is overlaid with horizontal light trails in white, yellow, and pink, suggesting motion and modernity. The skyline is reflected in the water in the foreground.

刑事合规业务前沿

二〇二四年第一期（总第四十八期）

上海市律师协会刑事合规专业委员会

目录

一、新规速递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发布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1

二、行业资讯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 7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主要举措及阶段性成效的通报 17

三、经典案例

1.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依法惩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典型案例 22

上海律协
刑事合规专业委员会编

主 任：虞思明
副主任：顾 伟
李天航
罗根达
编 辑：熊云凤

2024 年 8 月 30 日



一、新规速递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23 年 3 月 20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80 次会议、2024 年 3 月 29 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届检察委员会第二十八次会议通过，自 2024 年 8 月 20 日起施行)

为依法惩治洗钱犯罪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现就办理洗钱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

第一条 为掩饰、隐瞒本人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洗钱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二条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他人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为掩饰、隐瞒其来源和性质，实施该条第一款规定的洗钱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三条 认定“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应当根据行为人所接触、接收的信息，经手他人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情况，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种类、数额，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转移、转换方式，交易行为、资金账户等异常情况，结合行为人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供述和辩解，同案人指证和证人证言等情况综合审查判断。有证据证明行为人确实不知道的除外。

将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某一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认作该条规定的上游犯罪范围内的其他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不影响“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认定。

第四条 洗钱数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情节严重”：

- （一）多次实施洗钱行为的；
- （二）拒不配合财物追缴，致使赃款赃物无法追缴的；
- （三）造成损失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
- （四）造成其他严重后果的。

二次以上实施洗钱犯罪行为，依法应予刑事处罚而未经处理的，洗钱数额累计计算。

第五条 为掩饰、隐瞒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来源和性质，实施下列行为之一的，可以认定为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来源和性质”：

- （一）通过典当、租赁、买卖、投资、拍卖、购买金融产品等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 （二）通过与商场、饭店、娱乐场所等现金密集型场所的经营收入相混合的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 （三）通过虚构交易、虚设债权债务、虚假担保、虚报收入等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 （四）通过买卖彩票、奖券、储值卡、黄金等贵金属等方式，转

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五）通过赌博方式，将犯罪所得及其收益转换为赌博收益的；

（六）通过“虚拟资产”交易、金融资产兑换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七）以其他方式转移、转换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

第六条 掩饰、隐瞒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上游犯罪的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构成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实施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洗钱行为，构成洗钱罪，同时又构成刑法第三百四十九条、第二百二十五条、第一百七十七条之一或者第一百二十条之一规定的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七条 认定洗钱罪应当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影响洗钱罪的认定：

（一）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有证据证明确实存在的；

（二）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因行为人逃匿未到案的；

（三）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因行为人死亡等原因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

（四）有证据证明上游犯罪确实存在，但同时构成其他犯罪而以其他罪名定罪处罚的。

第八条 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是指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实施相关犯罪

的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包括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该组织及组织成员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聚敛的全部财物、财产性权益及其孳息、收益。

第九条 犯洗钱罪，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的，判处一万元以上罚金；判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并处二十万元以上罚金。

第十条 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第二条的规定，行为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悔罪，并积极配合追缴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的，可以从轻处罚；犯罪情节轻微的，可以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于刑事处罚。

第十一条 单位实施洗钱犯罪的，依照本解释规定的相应自然人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定罪处罚。

第十二条 本解释所称“上游犯罪”，是指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条规定的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恐怖活动犯罪、走私犯罪、贪污贿赂犯罪、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诈骗犯罪。

第十三条 本解释自 2024 年 8 月 20 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洗钱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9〕15 号）同时废止。

最高检印发《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

依法严惩财务造假犯罪 维护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助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依法从严惩治欺诈发行、违规信息披露等财务造假犯罪，最高人民检察院经济犯罪检察厅于近日印发《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下称《解答》），明确财务造假犯罪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重点问题。

《解答》共 4 部分 15 条，就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总体要求，欺诈发行证券罪构成要件的把握及立案追诉标准的适用，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构成要件的把握及立案追诉标准的适用，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犯罪认定等问题提出明确意见。

《解答》坚持零容忍要求，坚持“严”的主基调，强调全链条追诉实施欺诈发行证券，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的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人员，为财务造假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的中介组织，以及其他配合上市公司实施财务造假犯罪的单位和个人。明确“情节特别严重”升档情节的把握标准，充分发挥刑法修正案（十一）增设升档法定刑的震慑作用。明确对于欺诈发行证券后，在持续经营阶段又实施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犯罪的，以及为欺诈发行证券向金融监管单位或人员行贿，又构成行贿犯罪的，均数罪并罚。

《解答》要求，对立案追诉标准要准确理解适用。两罪多项标准没有先后适用顺序，符合多项标准的必须全部查明；“直接经济损失”



的认定可以参照民事判决或者依法委托专门机构出具测算报告；详细规定了虚增或者虚减资产、营业收入、利润以及未按照规定披露重大事项涉及数额占比的计算标准和方法。

《解答》明确，对公司、企业违反规定在账目上作跨期确认的，伪造财务数据后又实施虚假平账行为的，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层级多、链条长，涉及的公司、企业人员较多的，坚持分层分类处理；对中介组织及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或者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行业资讯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

关于办理财务造假犯罪案件有关问题的解答

财务造假犯罪主要涉及欺诈发行证券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以及提供虚假证明文件、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等几种犯罪。现就实践中遇到的一些问题，解答如下。

一、总体问题

（一）如何认定公司、企业的信息披露义务

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是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在证券发行、持续经营等不同阶段实施的隐瞒重要事实、编造重大虚假内容的信息披露犯罪。发行不同的证券、在不同的阶段，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和披露义务均有差别，准确认定公司、企业是否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及其披露义务是认定本罪的前提条件，对此应当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以及根据上述法律制定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作出判断。

1. 关于证券发行人在发行上市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证券发行人在发行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应当依据《公司法》《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

务监管规定》《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等，依法作出认定。需要注意的是，发行股票，既包括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也包括公司上市后公开发行股票、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债券，既包括上市公司发行债券，也包括非上市公司、企业发行债券；既包括公开发行债券，也包括非公开发行债券；既包括发行仅还本付息的信用类债券，也包括发行可转换为本公司股票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存托凭证，既包括境外公司在境内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也包括境内公司在境外发行存托凭证并上市。发行不同类型的证券，信息披露主体及义务存在差异，应当精准适用行政规定，依法作出认定。

2. 关于证券发行人持续经营阶段的信息披露义务。（1）公司股票发行后，上市公司、非上市公众公司对公司经营情况、财务情况、重大事件等负有定期披露义务和临时披露义务，应当依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依法作出认定。（2）债券发行后，发行人在债券存续期内负有定期披露义务和临时披露义务，应当依据《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依法作出认定。（3）境外公司在境内发行存托凭证并在境内交易所上市后，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对境外公司经营情况、财务情况、重大事件等负有定期披露和临时披露义务，应当依据《证券法》《存托凭证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试行）》《境内外证券交易

所互联互通存托凭证业务监管规定》《创新企业境内发行股票或存托凭证上市后持续监管实施办法（试行）》等，依法作出认定。

3. 关于具体事项的披露义务。对于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具体事项的披露义务，可以根据上市规则以及证券交易所制定的具体事项信息披露指引等，依法作出认定。

（二）罪数问题

1. 关于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罪数问题。公司、企业利用相同的虚假财务数据，先后实施欺诈发行证券行为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行为，属于实施了两个违法行为，分别构成犯罪的，应当同时以欺诈发行证券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追究刑事责任。

2. 关于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行贿犯罪的罪数问题。《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二）》（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第五条第八项规定，为欺诈发行证券向负有金融监管职责的单位或者人员行贿，应当立案追诉。本项规定应作如下理解：具有客观行贿事实即符合本罪的立案追诉条件，行贿行为同时构成犯罪的，应当数罪并罚。

（三）多项立案追诉标准是否有先后适用顺序，符合多项标准的是否必须全部查明

1. 立案追诉标准规定的多项标准是并列适用的关系，在适用上有准确选择的要求，但没有优先、劣后之分，达到其中一项标准的就应予立案追诉。其中，第十项兜底条款在适用上虽应慎重把握，但与

同条款的其他规定仍属并列适用关系。

2. 财务造假犯罪由于财务指标互相关联，犯罪行为往往同时符合几种追诉标准，对此从法律和道理上讲，应当依法全部查明，以便全面评价犯罪情节和危害后果。

（四）如何认定“直接经济损失”

立案追诉标准对欺诈发行证券罪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均规定“造成投资者（股东、债权人或者其他入）直接经济损失数额累计在 100 万元以上的，应予立案追诉”。对此，相关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已有生效判决的，可以参照民事判决对直接经济损失作出认定；直接经济损失数额难以准确计算的，应当依法委托专门机构出具测算报告后予以审查认定。

（五）如何把握“情节特别严重”的升档标准

立案追诉标准规定的定罪量刑情节大致可以分为数额、比例及其他情形三种。对于数额，可按司法实践通行的五倍关系把握刑罚升档标准。对于立案追诉标准规定的比例、其他情形的升档标准，因不同造假主体的规模体量差异较大，可按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并结合常情常理，在个案当中积极探索，积累认定经验。

（六）关于支持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问题

财务造假犯罪危害严重，应当坚持刑事、行政、民事立体化追责。检察机关支持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有关方面提出复制材料等协助请求的，应当依法配合。

（七）公司、企业违反规定在账目上作跨期确认，但涉案交易真

实存在的，如何处理

公司、企业违反《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等的规定，跨期确认收入、跨期确认成本以及跨期确认应当计入当期利得或损失等情形，属于财务造假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涉案交易真实存在的，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

（八）涉案人员的分层分类处理问题

财务造假犯罪层级多、链条长，涉及的公司、企业人员也较多，对此应坚持分层分类处理。

1. 公司、企业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等高级管理人员，实施或组织实施财务造假行为，或者签字确认明知虚假的信息披露文件的，应当以欺诈发行证券罪或者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上述人员是否明知，应当根据其对公司、企业的控制权、决策权以及具体管理职责等，综合认定。

2. 公司、企业体系内的中层负责人或者一般工作人员，在财务造假行为中负有部分组织责任或者积极参与起较大作用的，应当以欺诈发行证券罪或者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受单位领导指派或者奉命参与实施一定犯罪行为的人员，作用不大的，一般不宜作为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

3. 单位或个人通过签订虚假交易合同、资金空转等手段，配合公司、企业实施财务造假行为，构成合同诈骗、虚开发票、逃税等犯

罪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成立财务造假犯罪共犯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单位或个人专门为公司、企业提供财务造假“一条龙”服务的，应当从严打击。

二、关于欺诈发行证券罪的问题

（九）本罪规定的债券有哪些

本罪规定的公司、企业债券，是指公司、企业依照法定程序发行、约定在一定期限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既包括在交易所市场发行的债券，也包括在银行间市场发行的债券。在办案过程中，遇到新类型或不常见的债券，可在征求主管部门意见后，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基本原理，按照“还本付息”这一债券的共同属性，依法作出认定。

（十）本罪立案追诉标准第二至四项规定的虚增或者虚减资产、营业收入、利润的占比，是按照发行文件披露的几个会计年度的总和计算，还是按照不同会计年度分别计算

发行股票或债券对企业财务指标有不同的要求，可以分为对最近几年每年财务指标的要求、对最近几年平均财务指标的要求和对最近一期财务指标的要求，发行文件对相应的财务指标均应作全面披露。根据立案追诉标准第二至四项的规定，比例计算的分子是“虚增或者虚减的资产、营业收入、利润”，分母是“当期资产总额、营业收入总额、利润总额”，发行文件中虚假披露的是最近几年每年财务指标的，分子、分母按照不同会计年度数据分别计算；虚假披露的是最近几年平均财务指标的，分子、分母按照披露的最近几个会计年度绝对金额的总数计算；虚假披露的是最近一期或者期末财务指标的，分子、分

母按照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数据计算。

(十一) 本罪立案追诉标准第五项“隐瞒或者编造的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数额达到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 50%以上的”，不同类型重大事项是单独计算还是合并计算，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是指哪一期

该项以重大事项违规披露数额与净资产的比例为立案追诉标准，分子、分母的计算应注意：

1. 分子：为隐瞒或者编造重大事项的数额，采用“先并后合”的方法计算。“先并”指重大诉讼、担保、仲裁、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应当合并计算，“后合”指任意连续十二个月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应当累计计算，可跨不同会计年度。

2. 分母：为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最近一期”指发行文件披露当期。发行上市阶段要求披露的信息是为了让投资者了解公司、企业发行时经营状况，为投资决策提供参考，重大事项对投资者决策的影响也应体现为对发行当时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因此以重大事项所涉数额占发行当期净资产的比例认定情节严重程度。

三、关于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问题

(十二) 本罪立案追诉标准第五项“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或者连续十二个月的累计数额达到最近一期披露的净资产 50%以上”如何理解，是否应当按照临时披露义务、定期披露义务分别计算

根据证券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第八十一条的规定，依法负有信息披露义务的公司、企业对重大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负有临时报告、定期报告双重信息披露义务。因此，对于临时披露重大事项违规比例、定期披露重大事项违规比例应当分别计算，其中一个比例达到该项标准的就应当立案追诉。

1. 关于临时披露重大事项违规比例的计算。发生可能对证券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公司、企业应当及时披露。对于违反该临时披露义务的，违规比例计算方法为：分子采用“先并后合”的方法，先将未按规定披露的重大诉讼、担保、仲裁、关联交易以及其他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合并计算，后将任意连续十二个月未按照规定披露的重大事项所涉及的数额累计计算，可跨不同会计年度；分母采用连续十二个月最后一笔未按规定披露重大事项往前最近一期年度报告披露的净资产。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分子，对于单笔重大事项未达临时披露标准，多笔重大事项累计达到临时披露标准的（按照交易所业务规则，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按不同类型分别累计至一定数额的应当临时披露），以累计至披露标准的当次应当披露的数额计入分子。关于分母，由于交易所业务规则规定重大事项是否应当临时披露，一般以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数额的比例为标准，因此分母选取经审计的年度报告，不选取中期报告。

2. 关于定期披露重大事项违规比例的计算。定期披露文件应当对当期的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进行完整披露。对

于违反该定期披露义务的，违规比例计算方法为：分子采用当期披露文件未按规定披露的诉讼、仲裁、担保、关联交易等重大事项所涉及的合并数额；分母采用当期披露文件披露的净资产

（十三）本罪的追诉时效问题

1. 伪造财务数据后又实施虚假平账行为的，该虚假平账行为是财务造假行为的一部分，追诉期限从虚假平账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2. 公司、企业违规不披露重要信息，违法行为有继续状态的，继续状态结束之日为行为终了之日，追诉期限从该日起计算。

四、关于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犯罪的问题

（十四）关于定罪问题

中介组织及其人员故意提供虚假证明文件，情节严重的，以提供虚假证明文件罪追究刑事责任，其同时参与财务造假行为成立财务造假犯罪共犯的，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中介组织及其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严重不负责任，出具的证明文件有重大失实，造成严重后果的，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五）关于严重不负责任的认定问题

办理中介组织及其人员犯罪案件，如何认定严重不负责任是经常遇到的问题。所谓严重不负责任，一般指不遵守规定或能为而不为，不同性质的中介组织因职责各异而有不同的判断标准。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人员为例，目前既有案例的认定标准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未按审计准则履行必需的审计程序；一般审计人员能够正常发现的问题而未发现；未开展审计工作而直接签字确认审计结论等。实际办案



不能囿于既往认定情形，具体认定标准要保持必要的开放性，以制衡越来越隐蔽的犯罪手法和行为人越来越强的反侦查能力；同时还应注意到，严重不负责任背后往往隐藏有利益关联或利益输送行为，对此应当坚持深挖彻查、全面打击。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

关于“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主要举措及阶段性成效的通报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政法工作会议精神，加强对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最高人民检察院组织自 2024 年 2 月至 12 月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专项行动开展以来，在最高检的统筹指导下，各地检察机关认真落实专项行动工作方案要求，以高质效办理涉企案件为中心，结合实际创造性开展工作，扎实推进各项重点任务，护企工作取得新成效。

一、总体工作情况

检察机关开展“检察护企”专项行动，聚焦重点任务，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运用法治方式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上半年起诉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犯罪 6.2 万人，同比上升 36.5%。起诉民营企业关键岗位人员职务侵占、挪用资金、受贿等利用职务便利实施的涉企犯罪 5827 人，同比上升 41.1%。检察机关护航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起诉侵犯知识产权犯罪 8894 人，同比上升 45.5%；办理知识产权民事行政诉讼监督案件 1837 件，同比上升 74%；办理知识产权领域公益诉讼 480 件。

二、主要举措和成效

（一）强化领导指导，持续压紧压实工作责任

最高检下发专项行动工作方案后，各地检察机关聚焦专项行动工

作重点，结合实际进一步细化制定工作方案。落实最高检关于把“检察护企”专项行动作为“一把手工程”的要求，大多数省级院检察长亲自担任专项行动领导小组组长，定期听取工作汇报，组织研究解决工作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最高检切实加强督促指导，于 3 月、6 月分别组织召开全国检察机关“检察护企”专题培训会议、专项行动推进会，进一步明确专项行动重点工作方向、提出具体要求。最高检派调研组深入 9 省市详细了解专项行动开展情况，就发现的突出问题向各省级院检察长制发工作提示函、向各省级院下发工作通知，持续促进专项行动走深走实。

（二）加强机制建设，着力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

最高检对收集到的各类可能涉及趋利性执法司法的 1300 余条线索逐条分析研判，将核查筛选出的 24 件重点案件，分三批交相关省级院办理。这些案件既包括防止国有资产损失，也涉及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体现对各类经营主体的依法平等保护。案件督办中发现跨区域抓捕、违规适用强制措施过程中造成死亡、超权限、超范围、超数额、超时限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等严重损害企业、企业家合法权益行为，检察机关在交办督办中有力发挥法律监督作用，不仅对个案问题及时纠错，更主动从个案办理中发现相关类案问题，为研究提出解决方案提供有力抓手。对跟踪审查中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 5 件交办案件，最高检派出工作组分赴江西、云南、甘肃、内蒙古等地现场阅卷、督导办理。

最高检有力推动，重点案件涉及的省检察院党组高度重视，交办

督办工作进展顺利，部分案件已经得到纠正，问题得到解决，取得良好效果。比如，第一批交办案件中，安徽检察机关及时监督公安机关对一起因司法解释变化不构成犯罪案件终止侦查，扣押的 800 万元已返还当事人。各地检察机关在专项行动中也积极摸排、监督涉企趋利性执法司法问题，努力保护好各类经营主体合法权益。

（三）“四大检察”同向发力，提升涉企办案监督质效

一是聚焦重点领域高质效办案。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中，依法惩治涉企非法高利放贷、欺行霸市、强迫交易等涉黑恶犯罪。最高检对涉及矿产资源企业的云南张某某等人涉黑案、涉及玉器企业经营的河南符某某等人涉恶案进行督办。强化对危险化学品、矿山、建筑施工等重点行业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的法律监督，督促涉案企业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排除风险隐患。依法查办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重庆检察机关深挖虚假诉讼、违法执行等背后的涉企司法渎职行为，对某法官滥用职权、枉法裁判造成涉案企业重大经济损失的行为立案侦查。持续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新兴产业领域知识产权保护，最高检指导上海检察机关对一起非法获取某公司芯片核心技术，造成 3 亿余元人民币损失的案件，以侵犯商业秘密罪提起公诉。

二是针对影响营商环境突出问题强化法律监督。加大对涉企虚假诉讼案件的监督力度，运用信息化手段全面审查案件事实，通过数据引领、重点审查等方式全面排查虚假诉讼案件线索，提升企业信心和“安全感”。强化民事执行活动监督，着力纠正违法行为，盘活企业资产，激发企业活力。推动涉企罚款系统治理，落实“过罚相当”原则。

福建省检察院会同省高级法院、省市场监管部门、司法厅研究会商形成会议纪要，统一小作坊、小餐饮、小摊贩“三小”食品安全违法行为减轻处罚裁量标准。积极探索反垄断领域公益诉讼，聚焦违法违规骗取套取、截留挪用各类助企补贴等情形加强监督履职。

（四）坚持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精准对接企业需求

在开展专项行动过程中坚持问需企业，“有呼即应、无事不扰”。最高检赴全国工商联、国家发改委走访调研，就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民营经济促进法等重点问题座谈交流、发现线索、凝聚共识。天津市检察院制定《关于进一步深化检察机关服务国资安全与国企发展调研服务的工作方案》，由市院检察长、副检察长、专职检委及各分院检察长分别带队赴部分驻津央企、重点国有企业开展调研、服务。江苏省检察院联合省国资委组织开展国企领域职务犯罪警示教育活动中，加强检企良性互动，提升国有企业廉洁建设质效。上海检察机关深入辖区产业园区了解企业生产经营和法治需求，从金融创新、知识产权、网络安全、犯罪预防等多方面提供法律服务。

三、下步工作重点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主动对接《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部署要求，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持续深化“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全面履行各项检察职能，依法服务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强产权司法保护，防止和纠正利用行政、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健全依法甄别纠正涉企



冤错案件机制，持续做实对各类经营主体依法平等保护，以法治力量稳定社会预期、提振发展信心。加强督促指导、统筹推进，强化检察机关纵向贯通、横向联动，加强与其他执法司法机关的协作配合，进一步凝聚解决涉企突出问题合力，切实将“护”融入高质效的司法办案之中，将“实”贯穿于专项行动始终，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以更优检察履职服务营造良好的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三、经典案例



最高检、公安部联合发布依法惩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典型案例

全链条从严惩治犯罪，依法维护国家税收安全

近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布了“依法惩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典型案例”。近年来，不法分子以假报出口等欺骗手段，骗取出口退税，严重危害国家税收征管秩序，不仅破坏外贸出口秩序，而且造成大量国家税款损失，严重破坏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为规范税收秩序、营造良好贸易营商环境，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打击虚开骗税专项行动，依法从严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查办了一批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案件，惩处了一批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分子，形成了有力震慑效应；同时，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与有关部门建立了常态化打击虚开骗税违法犯罪工作机制，形成执法司法工作合力，提高了打击质效。这批典型案例即是前一阶段打击成效的具体体现。

这批典型案例包括 S 公司等企业、何某斌等人骗取出口退税、陈某江等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黄某鹏等人骗取出口退税，非法经营，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案，卢某锋、林某等 7 人骗取出口退税、贺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胡某粮等 7 人骗取出口退税案。这 4 个案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体现了对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从严打击。对于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企业被判处巨额罚金，对于罪行特别严重的犯罪分子依法判处无期徒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二是体现了对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全链条打击。既打击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也注重

查处和打击为骗取出口退税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非法经营等辅助型犯罪；对于骗取出口退税的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法数罪并罚。三是体现了准确认定犯罪。扎实调取固定证据，依法准确认定骗取出口退税单位犯罪和个人犯罪、主从犯以及犯罪数额，把好事实关、证据关、法律适用关、程序关，确保办案质量。四是体现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准确区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根据罪行程度不同依法分类处理，严厉打击罪行严重的少数，宽缓处理从犯。对于具有坦白、自首、立功、认罪认罚、退赃退赔等从轻、减轻情节的，依法落实从宽政策。这批典型案例，对于推动各地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办理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案件，正确适用法律和刑事政策，具有较强的示范、引领作用。

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继续加大查办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及相关犯罪力度，始终保持对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的依法严惩态势，维护国家税收和对外贸易正常秩序，助力营造公平、和谐、有序、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案例一

S 公司等企业、何某斌等人骗取出口退税，陈某江等人
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关键词】

骗取出口退税 虚开增值税发票 全链条打击

【基本案情】

被告单位 S 贸易有限公司、B 经贸有限公司、B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S 公司等三家企业）。

何某斌，S 公司等三家企业实际控制人。

黄某平，S 公司等三家企业股东、管理人员，香港 J 集团发展有限公司（下称 J 公司）实际控制人。

余某芬、赵某贞、陈某荣、倪某丽、周某兰、关某明、冯某宏、廖某雯，均系 S 公司等三家企业雇员。

陈某江、张某鹏、梁某芬，均系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行为人。

2014 年 3 月至 2019 年 6 月，何某斌、黄某平等人为了骗取出口退税，以被告单位 S 公司等三家企业的名义，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向他人购买货物出口的单证信息，伪造购销合同、资金回流，并指使被告人陈某江、张某鹏、梁某芬为被告单位 S 公司等三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并通过何某斌的香港公司、黄某平的 J 公司等多种方式购买外汇虚假结汇。通过上述“买单”“配票”“买汇”环节，虚构被告单位 S 公司等三家企业已实际出口货物事实，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项共计 1.51 亿余元。

陈某江、张某鹏、梁某芬在没有实际货物交易的情况下，分别为被告单位 S 公司等三家企业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其中陈某江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4266 份，价税合计 4.43 亿元，税额 0.64 亿元；张某鹏、梁某芬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5541 份，价税合计 5.75 亿元，税额 0.82 亿元，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均被用于骗取出口退税。

【诉讼过程】

2019 年 12 月 26 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公安局以 S 公司等三家企业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何某斌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陈某江等人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移送审查起诉。2020 年 8 月 25 日，广东省佛山市人民检察院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对 S 公司等 3 家企业、何某斌等 10 人、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陈某江等 3 人提起公诉。

2021 年 9 月 8 日，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 S 公司等三家企业、何某斌等 10 人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 S 公司等三家企业七千五百万元到三千二百万元不等罚金；判处何某斌、黄某平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其余 8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五年至三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认定陈某江等 3 人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到四年六个月不等的刑罚，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三百万元到罚金不等。宣判后，何某斌等人提出上诉。2023 年 7 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不仅严重危害国家税收征管秩序，造成大量国家税款损失，而且破坏外贸出口秩序和法治化营商环境。司法机关要根据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准确把握定罪量刑标准，对该类犯罪保持严厉打击态势。本案中，S 公司等三家企业骗取出口退税 1.51 亿余元，犯罪数额特别巨大，依法被判处 7500 万至 3200 万巨额

罚金，对作为单位直接负责主管人员的何某斌、黄某平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分体现了对罪行严重的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从严打击。

（二）实践中，犯罪分子为逃避国家监管，将骗取出口退税犯罪行为伪装成正常商业交易，往往在一个地区催生出买单、配票、买卖外汇的黑灰产业链。对此，司法机关要坚持全链条打击理念，一体化加大对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等关联犯罪的打击力度，摧毁骗取出口退税犯罪生态链。本案中，司法机关对组织策划骗取出口退税活动的何某斌、与何某斌共谋经营并配合非法买卖外汇的黄某平，以及为骗税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的陈某江等人均予以追究刑事责任，彻底斩断骗取出口退税犯罪链条，形成震慑效应。

案例二

黄某鹏等人骗取出口退税，非法经营，
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案

【关键词】

骗取出口退税 非法经营 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 数罪并罚 宽严相济

【基本案情】

黄某鹏，S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下称 S 公司）实际控制人。

邱某富、邱某财、黄某苗、邵某云、余某玲、温某玲、肖某、王

某容、余某洁，以及叶某玲、汤某芳等 4 人，均系 S 公司雇员。

刘某，X 皮具有限公司（下称 X 公司）实际控制人。

陆某杰，报关公司实际控制人。

2017 年 3 月，被告人黄某鹏与邱某富、邱某财、刘某等人合谋，以正规经营公司为幌子，通过买单卖单、虚构货物出口、虚假结汇等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2017 年 3 月至 2019 年 3 月，通过共同控制 X 公司等“壳”公司的经营权，将市场上有实际出口业务但没有退税资格的外贸单转换成上述“壳”公司的出口外贸单，然后通过购买虚假的报关单、虚假的进项发票和非法结汇的手段，以上述“壳”公司的名义申请出口退税，骗取出口退税共计人民币 2600 余万元。

2016 年 3 月至 2019 年 4 月，被告人黄某鹏伙同邱某财等人通过 QQ、微信等形式联系外贸客户，以较高汇率吸引外贸客户将外币汇入黄某鹏等人在境外开设的公司对公账户中，使用黄某鹏控制的境内个人账户将对应的人民币转账给外贸客户，经审计，被告人黄某鹏等人以上述方法买卖外汇共计折合人民币 1.12 亿余元。

2015 年 11 月开始，S 公司在接受部分需要“买单报关”（即客户有出口需求但没有出口经营权）外贸客户委托报关出口的过程中，获得大量真实的出口报关资料。黄某鹏为牟取非法利益，与陆某杰合谋买卖报关单牟利。黄某鹏控制的 S 公司将真实的报关资料（包括货物柜号、装箱单、订舱单等）出售给陆某杰控制的报关公司。陆某杰将上述报关资料套用有出口经营权的外贸单位名称，向海关申报取得海关签发的报关单，然后将报关单卖给上述报关单上的申报经营单位牟

利。之后，陆某杰按约定，以每份 2000 元至 15000 元不等的价格，向黄某鹏控制的 S 公司支付费用。经审计，2015 年 11 月至 2016 年 11 月，黄某鹏指使余某玲买卖报关单共计 83 份。此外，黄某鹏在经营过程中，为了方便报关业务，私刻伪造了“广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的公章 1 枚。

【诉讼过程】

2019 年 7 月 31 日，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天河区分局以黄某鹏等 15 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非法经营罪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2020 年 3 月 17 日，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骗取出口退税罪、非法经营罪、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对黄某鹏等 11 人提起公诉；同日对起次要作用的受雇普通员工叶某玲等 3 人相对不起诉，对汤某芳存疑不起诉；2021 年 4 月 22 日又补充起诉了黄某鹏等 6 人骗取出口退税的部分犯罪事实。2022 年 3 月 15 日，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骗取出口退税罪、非法经营罪、伪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印章罪判处黄某鹏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罚金七百二十三万元；以骗取出口退税罪、非法经营罪分别判处邱某财等 2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四年、九年，并处罚金六百一十二万元、三百零八万元；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邱某富等 3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十三年至五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以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被告人余某玲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以非法经营罪判处其余 4 名被告人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至三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宣判后，黄某鹏、邱某财、邱某富等 6 人上诉，2023 年 7 月 13 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

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呈现出犯罪链条长，涉及多个环节违法犯罪行为的特征，办理此类案件要注意查实相关人员在买卖关单、非法购汇、配货配票等环节，是否涉嫌其他犯罪，依法准确认定罪名罪数，对于骗取出口退税的同时又构成其他犯罪的，依据刑法有关规定数罪并罚。本案中，犯罪团伙开展非法兑换外汇与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行为一开始并非是为了骗取出口退税，而是直接从中牟利，在案证据证实，指控的兑换外汇与买卖国家机关证件行为均未与涉案公司虚假出口骗取出口退税的犯罪活动重合，不属于牵连犯，分别独立构成非法经营罪和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应当数罪并罚。

（二）骗取出口退税犯罪涉案人员众多，司法机关在办案中应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通过完善证据，查清犯罪嫌疑人在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从而准确区分主从犯，根据罪行程度不同依法分类处理，严厉打击罪行严重的主犯，从宽处理从犯。本案中，经补充侦查，追加认定主犯的犯罪数额，并补充起诉了主犯黄某鹏等人部分骗取出口退税犯罪事实，对于犯罪参与程度不深、起次要作用的余某玲等多人依法认定为从犯，对涉案公司普通员工叶某玲等三人依法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案例三

卢某锋、林某等 7 人骗取出口退税，贺某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

【关键词】

骗取出口退税 虚开增值税发票 单位犯罪 检察建议

【基本案情】

卢某锋，A 供应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A 公司）总经理。

林某、黄某琦，B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二人系夫妻关系。

詹某可，深圳市 C 报关行员工。

贺某，棉纱从业人员。

2015 年 11 月至 2018 年 6 月，林某、黄某琦在广东省深圳市通过向詹某可等报关从业人员非法购买报关单信息，并雇佣他人虚构购销合同、伪造海运提单，通过其控制的某皮具制品有限公司等十余家生产企业根据上述伪造的出口信息，向 A 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卢某锋在明知上述报关资料系伪造且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仍利用其职权，擅自决定以 A 公司名义将上述发票及资料入账向税务机关申报出口退税共计人民币 514 万余元，骗取出口退税款人民币 428 万余元，剩余 86 万余元因被发现骗税未得逞。卢某锋等人实施骗取出口退税款，A 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主管均未参与。骗取出口退税款所获的 428 万余元赃款由卢某锋亲属账户收取后，卢某锋分赃获得人民币 171 万余元，林某、黄某琦共同非法获得人民币 257 万余元，A 公司也未从中获利。

被告人贺某在无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下，为获取非法利益，将某棉业公司价税合计人民币 170 余万元，税额人民币 24.72 万元的 3 份

增值税专用发票，销售给林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林某等人将上述增值税专用发票抵扣进项税后，向 A 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

【诉讼过程】

2019 年 1 月 28 日，山东省莱西市公安局以卢某锋等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贺某涉嫌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2019 年 8 月 15 日，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检察院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对卢某锋等人、以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对贺某提起公诉。莱西市人民检察院还向 A 公司制发了检察建议，建议该公司加强业务监管。2021 年 4 月 14 日，山东省莱西市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卢某锋等人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卢某锋有期徒刑十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百五十万元；判处林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五百五十万元；对黄某琦等从犯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至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认定贺某犯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二年，并处罚金。宣判后，卢某锋、林某、黄某琦提出上诉。2021 年 10 月 15 日，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往往以公司为载体实施，是否构成单位犯罪，需要依据单位犯罪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完善相关证据，予以准确认定。以单位名义实施骗取出口退税犯罪，违法所得归单位所有的，应认定为单位犯罪；对于虽以单位名义实施犯罪，但并非出于单

位集体决策，犯罪收益并非归单位所有的，应以个人犯罪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主犯卢某锋为公司总经理，主要负责代办出口退税工作，但公司内员工及管理人員的证言及银行流水等，证实该公司法定代表人及财务主管均未涉及骗取出口退税行为，犯罪所得亦是通過卢某锋亲属账户收取，不符合单位犯罪中意志因素和利益分配的规定，故未认定为单位犯罪。

（二）司法办案机关办好案件，既要准确认定犯罪事实，从严惩处犯罪，追究刑责，又要积极延伸司法职能，对办案中发现的管理体制机制漏洞，从社会治理角度及时提出完善建议。本案系犯罪分子利用外贸综合服务企业骗取出口退税，涉案 A 公司从董事层到普通员工均对外综服平台业务不熟悉，相关工作流程及经营管理模式均由卢某锋整套沿袭搬用自其他公司，实操中工作人员发现“跟客户之间的供货协议，晚于客户货物报关出口”等不正常现象，也未深入研究或逐级上报，最终为犯罪分子大开方便之门。检察机关总结涉案企业境外账户异常、商业行为异常、内部人员异常等多个经营风险点，制发检察建议提出对重点部门、关键岗位、多个层级的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法治宣传，并督促落实到生产经营活动中，为促进外综服平台企业规范化法治化运行贡献检察力量。

案例四

胡某粮等 7 人骗取出口退税案

【关键词】

骗取出口退税罪 犯罪数额 认罪认罚

【基本案情】

胡某粮，X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X 公司）、L 供应链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L 公司）等企业实际控制人。

叶某强，X 公司、L 公司法定代表人。

娄某瓯、刘某伟、吴某瑶，均系胡某粮公司员工。

郑某，Y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下称 Y 公司）实际控制人。

施某建，买卖报关材料中介。

2012 年至 2020 年 8 月，被告人胡某粮利用 Y 公司等八家外贸公司的名义，伙同被告人叶某强、娄某瓯、刘某伟、吴某瑶、郑某等人，虚受由胡某粮实际控制的 X 公司、L 公司向他人购买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另还向被告人施某建等人购买外贸提单、放行单、报关单等报关材料，向他人购买外汇，伪造虚假的外贸出口业务，骗取出口退税。其中，胡某粮系骗税团伙主要负责人，利用上述手段，以上述八家公司名义，骗取出口退税共计 1.114 亿余元。叶某强负责购买外汇和帮助购买报关材料等相关事宜，共同骗取出口退税。娄某瓯、刘某伟、吴某瑶 3 人，受胡某粮雇用和安排，分别担任涉案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会计、出纳，负责联系购买增值税专用发票、外汇和报关材料，参与制作会计资料、汇款转账等，帮助骗取出口退税。施某建向胡某粮等人出售外贸单证等报关材料，帮助骗取出口退税。郑某通过 Y 公司配合骗取出口退税。案发后，胡某粮以涉案公司名义退出违法所得共计 88.65 万元，该案审理期间，施某建退赃 20 万元。

【诉讼过程】

2021 年 2 月 19 日，浙江省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以胡某粮等 7 人涉嫌骗取出口退税罪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在本案审查起诉及退回补充侦查阶段，检察机关会同侦查机关对于可能存在真实贸易的情况，经对涉案企业资金流水进行逐笔追查，并与在案书证、言辞证据核对，从而准确认定犯罪数额为 1.114 亿余元。2021 年 10 月 8 日，浙江省温州市人民检察院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对胡某粮等 7 人提起公诉。

2022 年 8 月 25 日，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认定胡某粮等 7 人犯骗取出口退税罪，判处胡某粮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判处其余 6 人有期徒刑十年至三年不等的刑罚，并处罚金。宣判后，胡某粮、娄某瓯提出上诉。2022 年 11 月 30 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典型意义】

（一）准确认定数额。犯罪数额是骗取出口退税罪的入罪条件和法定刑升格条件，准确认定骗取出口退税数额是办好此类案件的前提。司法机关在实践中，可以在收集完善与数额认定相关数据的基础上，结合会计、审计等专业鉴定机构出具的鉴定意见确认指控的犯罪金额。本案中骗税团伙作案时间跨度达 8 年之久，涉及上游开票企业遍及全国各地，办案机关立足完善证据体系，多次与委托的注册会计师面商，通过设定对敲交易匹配条件，执行商定程序，精准传递办案需求，形成与在案证据相呼应的第三方报告，准确认定犯罪数额。



（二）精准指控犯罪。骗取出口退税犯罪往往参与人数众多，办案机关在准确认定各犯罪嫌疑人所涉犯罪数额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深化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一方面敦促犯罪嫌疑人退赃退赔挽回国家损失，另一方面在案件侦查阶段查明的罪轻罪重情节的基础上，在案件起诉阶段依法提出具体的量刑建议，实现宽严相济、罚当其罪。本案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部分犯罪嫌疑人退清赃款，指控的全部犯罪金额及所提量刑建议均获法院判决采纳。

上海律协刑事合规专业委员会

电话：021-64030000

网址：www.lawyers.org.cn

地址：上海市肇嘉浜路 789 号均要国际广场 20、33、35 楼